

百年明信片上的老故事

我有1张十分珍贵的明信片,之所以视其为珍邮:一是时间久远,1919年11月14日寄出,距今近百年;二是中国人的信件往来,但是寄与收均在国外,是从法国塞纳寄往瑞士苏黎世的。写信人为皮宗石,收信人为丁文渊,信中还提及杨端六。正文如下:“月前上一函日昨又寄一片均系直寄Winterthur(温特图尔)旧寓不卜已收到否弟与杨端六君拟来月初三四日来瑞准在Zürich(苏黎世)住二三月届时即希代觅房间能在其家一并吃饭藉以练习讲话更好(如能两人分住两家尤好)瑞士给否托购德籍已寄到否余谈端此敬丁月波先生学安

皮宗石上”

近来,我对这枚明信片作了认真考证,发现明

信片牵涉到的3个人,当年都是风华正茂的留欧学子,后来均成了学有所成的著名学者,而这枚明信片的背景居然与巴黎和会以及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相关。

皮宗石(1887~1967),字皓白,别号海环,湖南长沙人,我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、法学家、教育家。早年留学日本,加入中国同盟会。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教授、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。他与蔡元培等一起筹建武汉大学,历任社会科学院院长、法学院院长、教务长,后又出任国立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,国民政府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、司法部秘书长。

丁文渊(1897~1957),字月波,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人,医学博士,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胞弟。早年

毕业于同济医学院,后受丁文江资助留学瑞士、德国,获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,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、参事,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参赞,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副院长,外交部专门委员,两度出任同济大学校长。1949年后,移居香港。

杨端六(1885~1966),原名杨勉,后易名杨超,原籍江苏苏州,祖辈落籍湖南长沙,我国当代经济学家,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,中国现代货币学、金融学的奠基人之一。1903年毕业于湖南省师范学堂,1906年赴日留学,加入中国同盟会。1920年,他分别陪同著名哲学家杜威和罗素在中国作巡回演讲,还在长沙做了“社会与社会主义”等3个专题演讲,被时任《大公报》特约记者的毛泽东记录下来,以“杨

端六讲,毛泽东记”的署名刊登在长沙《大公报》上。后来,出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,并兼任过所长,着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。

这枚明信片写于1919年,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,帝国主义列强企图通过巴黎和会进行“分赃”,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利益,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义愤的时期。正在伦敦求学的皮宗石、杨端六会同王世杰、李四光、周鲠生等,从英国渡海来到巴黎,与留欧中国学生、华工等一起,包围了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陆征祥的寓所,使陆征祥无法出席会议签字,被称为巴黎和会“踢馆”事件。这一行动受到了国内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的大力声援,演变成轰轰烈烈的五四运

动,这就是这枚明信片的历史背景。

“踢馆”事件发生后,北洋政府对策划者进行通缉,皮宗石、杨端六有国难归,决定赴瑞士暂住,于是致信丁文渊商请帮助代找住所。皮宗石与丁文渊如何相识?为什么会求助于丁?当时皮宗石32岁,杨端六34岁,丁文渊只有22岁,彼此相差10多岁。皮、杨赴英求学时,丁文渊还是一名16岁的少年。寄信的1919年,丁文渊刚刚出国来到瑞士,他们之间应无交集。信中称“月前上一函”,应该对赴瑞背景、细节交待得更详尽,可惜无存。谁是他们之间的牵线人?比较可靠的推断,应该是丁文江。丁文江虽然与皮宗石同龄,但巴黎和会期间已是中国政府代表团会外顾问。富有爱国情怀的他,会不会像梁启超将

山东问题的信息密告林长民一样,故意将相关信息透露给留欧学生,现在不得而知。但“踢馆”事件发生后,皮、杨等遭通缉,丁文江向胞弟推荐他们赴瑞士暂住,并提供帮助,是应有之义。后来,北洋政府撤销了通缉令,皮宗石、杨端六并未成行,而是回国从事教育工作,并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。

我的外公丁殿卿老先生是丁文渊的堂叔,我小的时候在外公家经常摆弄国外的铜折尺、外国的瓷碗,以及厚厚的外文医科书。当时不知道,家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外国的东西,现在想来,应该是丁文渊先生所遗之物。遗憾的是,在外公、外婆去世后,所有物品全已散失,唯有这枚明信片成了永远的纪念。(据《中华读书报》)

胡适章士钊合影之谊

2013年末,1张胡适(1891~1962年)与章士钊(1881~1973年)的合影照片(如图),亮相于北京传是国际拍卖公司秋拍,受到许多藏家与研究者关注,最终以69万元的价格落槌成交。这张照片以及胡、章二人的交往,一时成为社会各界热议话题。

据考,1925年2月初,章士钊与胡适在一次宴会上不期而遇,饭后便一起照了这张合影。相片洗印出来,章士钊在相片背后题了一首白话诗送给胡适:“你姓胡,我姓章,你讲什么新文学,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。你不攻来我不驳,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。将来三五十年后,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。哈哈,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,总算是老章投降了。”落款:“适之兄,章士钊,十四,二,五”。

题诗后还有章氏附言:“吴弱男看我写完大笑不止,写完此句,弱男更笑”。吴弱男(1886~1973年),安徽省庐江县人,是章士钊元配夫人,中国国民党第一位女党员,女权活动家。胡适对章士钊所题写的白话词也颇感喟,在相片边框处旁题了一首

七言诗酬答:“‘但开风气不为师’,龚生此言吾最喜;同是曾开风气人,愿长相亲不相鄙。”落款:“适,十四,二,九”。

一张合影,使胡、章两位名人的影像存留,且二人各有手迹附留其上,自然价值不菲。然而,关于胡、章二人的交往史事,能够因此合影的出现有所攀附与扩充的叙事却实在无多;无论怎么联络史料与梳爬文献,胡、章二人的交往史事,能够溢出这张合影的部分确实是寥寥。

就目前已知的史料文献考察,《胡适书信集》中竟无一通胡适致章士钊的信件;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中,也只选录了两通章士钊致胡适的信件。《胡适日记(全集)》中关涉章士钊的内容很少,亦不足为研究之据。

好在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(第33册),尚辑有章士钊致胡适信件六通,其中两通已为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所选录,其余四通尚未有录文,或正可从中

管窥胡、章二人交往史事。书中所辑第四通章信,就恰与二人合影事有关,信文如下:

适之兄:大安。相片4张奉上,账已算过,请勿烦

不仅再一次确证了,二人合影题诗的具体时间,也间接说明了胡、章二人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已然没有什么“白话与文言”之争了,二人也并未因为文学

治学新意的浓厚兴趣。须知,时年24岁的胡适尚在美国留学,而时年34岁的章士钊则寓居日本东京,二人的文字之交,虽远隔重洋,却也心意真挚。1920年11月24日,身在上海的章士钊,再次致信时已在北大任教的胡适,这一通信,更可见二人私交之密。

这封信中所交待的事由,乃是胡适在为他人证婚之后,将写好的贺联文字有所疑虑,婉请胡适重写一副。由于《胡适日记》没有相关记载,无从得知当时胡适究竟为何人证婚,其贺联原文究竟如何等细节,但长胡适10岁的章士钊以“过来人”的人事经验,谆谆劝慰之意还是颇见长者风范的。除与胡适商榷贺联内容之外,信中还可窥见章与胡适论学的内容。值得一提的是,章著《名学他辨》中,对当时已“暴得大名”的胡适名著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相关内容有相当批评,返过来

他此时却致信向胡适表示“很愿受你的批评”,“请你仔细看看,除了你恐怕很少的人能够批评了”;通过这些话语,不难窥见章在学术交流与切磋上还是足够真诚的罢。

当然,无论是从提倡白话文的“新文化运动”来考察,还是从提倡“好政府主义”的基本政治取向来考察,胡适在文化、教育、学术、政治等各领域的主张与行动,随着胡适的声名渐隆与章士钊政客生涯的“每况愈下”,二人的交集都越来越少。胡适从当年那位海外投稿的文学青年,摇身一变而为青年导师与文教界巨擘,章士钊则从创办《甲寅》杂志,继而出任教育总长,再被迫下台而为鲁迅斥之为“落水狗”,只得寓于杜月笙门下,终以挂牌律师为生计。胡、章二人的交往,因生涯各异、分道各行,自然渐行渐远。二人合影之后近20年,1943年,已蛰居“陪都”重庆六年的章致信时任驻美全权大使的胡适,信中除了客套寒暄语之外,无非捎带举荐了一位赴美的故友,别无他话,仅此而已。

(据《南方都市报》)



心。惟其中二人合照1张,弟有题词,兄阅后毋捧腹。兄如作一旧体诗相酬,则真赏脸之至也。奉请撰安。”

据此信可知,胡、章二人合影印成后,1925年2月5日当天,章在照片背后题写了白话词(诗)之后,又写成了这封信,一并寄给了胡适,嘱其题诗以和。这

理念与学术观念上的差异而产生什么交往上的嫌隙,二人私交还算不错。

事实上,现存章士钊致胡适信件中最早的一通(1915年3月14日,辑入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首页首号),其致信事由乃是因胡向章主编的《甲寅》杂志投稿而起的。在信中,章不但表示刊用其稿,更表现出对胡